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何以可能

霍龙伟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浙江省义乌市, 322000; hloveangel@163.com)

摘 要: 共产主义思想伴随启蒙运动诞生于 16 世纪, 但直到 18 世纪中叶科学共产主义创立, 它才真正成为现实的革命武器和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科学共产主义是对以往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和扬弃, 它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建立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之上的科学理论, 它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革命运动和业已实现的社会制度, 它有着自身的生成逻辑和实践逻辑。新中国七十余年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科学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和共产主义信仰的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共产主义; 人类社会; 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引言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最为广博深远, 受到的诋毁与污蔑也最甚。直到今天国内外仍有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只是空想, 国外的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诋毁和污蔑自然是最强烈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是一个贬义词, 它代表专制和独裁, 是同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情感绝对相悖的。部分中国人虽然不认为共产主义就等于独裁和专制, 但仍有不少人(包括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乌托邦, 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只是镜花水月。不得不说共产主义的光已经开始普照大地, 有些人却仍然躲在阴影中。

1 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

从中世纪日益没落的封建社会中孕育而生的资产阶级日益掌握了社会发展变革的主动权, 对财富的欲望使部分行会师傅、小市民、新兴贵族等群体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分子。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是为欧洲公元 1500 年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目的, 对财富的狂热欲望最终导致欧洲人历尽艰险开辟了新航路。海外殖民地的开辟以及对国内下层劳动者和国外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压迫为资产阶级的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取得统治权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也为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手中最终夺取统治权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反抗封建贵族时,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着共同利益, 但最终革命果实全部被资产阶级攫取, 无产阶级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 而只是换了主人而已。在资产阶级统治下, “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 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1]。”

十六至十七世纪, 面对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下层劳动人民更加悲惨的生活境遇, 最先察觉有产者与无产者不平等关系的是文学家和宗教学家以及个别同情无产者的有产者, 他们开始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抨击有产者的贪婪与虚伪, 开始艰难探索理想的社会形态。随着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在比利时正式出版, 空想社会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莫尔虽然有着资产阶级背景, 且长期工作于英国政界高层, 但他却勇敢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的罪恶, 同情由于圈地运动而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 幻想一个人人平等的公有制社会, 最终因为反对国王而被处死于伦敦塔, 莫尔也因此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一位探索者”[1]。相对于莫尔来说, 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闵采尔更注重发动底层教徒通过反对教会和世俗统治者的革命的实践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闵采尔同代表穷人利益的再洗礼派关系密切, 他不仅号召下层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僧

侣和封建贵族的剥削压迫，而且组织领导德国乡村农民和城市平民发动起义，企图“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财产公用、人人平等”[2]的理想社会。不过在当时教会和封建贵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四分五裂的德国，资产阶级尚且处于萌芽阶段，闵采尔利用宗教组织起来的小农和平民注定以失败收场，闵采尔最终因起义失败被封建贵族和教会秘密处死。受莫尔《乌托邦》一书的影响，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在1601年完成了《太阳城》，他高度宣扬劳动的价值和作用，提倡劳动与驾驭的结合[2]。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温斯坦莱在革命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统治者的虚伪和奸诈，批判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腐朽，开始抛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理念而主张土地公有，认为劳动人民是实现新的社会理想的主要力量[2]。十七世纪最后一位空想主义者维拉斯已经不再满足于设计想象的社会组织模式，他的消灭阶级和8小时工作制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彼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无产阶级的先驱们还不清楚自己的思想和社会活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贡献，他们对理性和自由的追求、对人人平等的渴望、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封建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和教会僧侣的不满使他们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考理性的社会制度，开启了探索人类幸福的历程。

英国经过光荣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定并逐步完善，政治的相对稳定则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受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法国资产阶级谋求政治权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加之启蒙运动，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法国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心。十八世纪法国空想主义者起初还是封建主和资本家的追随者，不过正是由于深入了解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发现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日益暴露的天然缺陷而开始远离“昔日盟友”，期望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摩莱里在《君主论》中认为公民是君主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在《自然法典》中已经开始抨击现存的制度，力图完全依照自然法则设计社会形态。服务法国宫廷的马布利最终与法国宫廷公开决裂，由主张构建一个“小土地私有者的共和国”[2]到抛弃私有制而颂扬公有制。受前人影响，巴贝夫相信土地和产品应当为全民公共占有，参加法国大革命后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中巴贝夫意识到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开始彻底抛弃资产阶级革命而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谋求通过人民革命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劳动者专政。

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财富，却为无产阶级带来了极端贫穷，无产阶级不仅要承受工厂主的疯狂压榨，大机器所带来的工作机会的减少，同时还要应对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却是政权反复更迭，社会长期动荡，启蒙思想家们所宣扬的公平、正义、博爱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属物，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则是“奢侈品”。无论是吉伦特派、雅各宾派还是拿破仑执政，在推进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却也忙于争权夺利，窃取国家财富，“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从个人角度来说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三人基本都受益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如果不投身为普通民众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他们完全可以享受自己的上流社会生活，但三人最终都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范围，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和路径以及各自所建构的理论体系毕其一生追求人类的正义、平等和幸福。

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亲历者，大革命并没有使法国走向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封建贵族和僧侣虽然被打倒，但是真正获益的只是有产者，而大多数无产者却被盟友抛弃，并未获得任何权利。圣西门日渐注意到工业和实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科学和工业成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他认为新社会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提出“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同时认识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3]。傅立叶对资产阶级展开激烈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奢靡堕落，构建起自己的“和谐世界”和“法郎吉”。傅立叶经历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后敏锐的察觉危机主要源于生产过剩，这一认识要比同时代甚至后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高明的多。欧文大概是19世纪空想主义者中最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代表，他至始至终都做着与所在阶级不一致甚至完全对立的事业，当同行们都忙着在工业革命中攫取更多利润时，欧文却在思考如何使无产者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欧文对于自己在新拉纳克为工人们创造的良好环境并不满足，他认为工厂的成果都应当归劳动者所有，社会生产力及其创造的成果应当属于全体人民。

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周围都聚集了大批追随者，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斗争形势的改变，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越来越不适应工人的现实需求。19世纪30年代，圣西门主义者由于脱离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而日渐没落，由于不支持英国宪章运动欧文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开始下降，而傅立叶主义者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但是空想主义后世的继承者们依然用各种缺乏科学性和辩证法的理论宣扬各自社会主义思想的绝对性，

他们认同社会主义的绝对性但每个人都有关于绝对性的不同解释，这种社会主义自然无法作为无产者战胜资产阶级的有力武器，历史呼唤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

2 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性

诋毁和污蔑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人其实是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东西指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他们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因为狂妄。马克思对以往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科学的批判，不再止步于资本主义道德的批判而是深入经济这一本质问题的批判，不再寄希望于通过法律和政治争取权益而是要彻底摧毁现有的法律和政治的权益，不再是通过宣传和示范的手段进入理想社会而是通过实践和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通过私有财产得以清晰的展现出来，矛盾的解决必然也需要通过私有财产来实现。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深入批判，无产阶级逐渐看清楚资产阶级这一天敌的伪善面目，科学的理论加上科学理论指导下的革命的阶级为科学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革命的武器和现实的动力。

2.1 科学共产主义：对以往空想社会主义积极的扬弃

空想主义三百余年的历史虽然日益证明其不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现实的要求，但它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空想主义思想家们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还未得到充分显现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3]。”空想主义者首先并不是明确的自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研究资产阶级革命，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代表全人类，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创造新的绝对的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形态。他们不仅代表贫民无产者的利益，同时还代表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甚至没落贵族的利益，傅立叶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现象，可是他不清楚如何历史的分析这种现象。此外，中世纪的没落致使经院哲学的凋零，经验论和怀疑论日益取得话语权且人的主体性价值日益得到彰显，神的神性被弱化，人的人性被强化，人的理性高于理性的人。于是，理性成了绝对真理，人不是通过现实的生活追求真理规范理性，理性和绝对真理反过来规范人的现实生活。空想主义者用思维的理性或理性的思维去衡量现实生活的合理性，他们与过去的一切划清界限，过去封建贵族的和资本主义的公平、正义、平等都是非理性的存在，以往的思想连同这些思想影响下的一切都是过时的，都必须为“真正的”理性所取代。于是，他们根据自己发现的“真正的”理性设计了一套新的社会形式，通过示范和宣传，教育和感化非理性的民众和统治者，进而影响全部国民，绝对理性的光辉便会普照大地，以此达到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伪善欺诈、不公罪恶等一切不符合理性的美好世界。空想主义者之所以只能停留于空想，最为根本是没有找到决定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钥匙——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在经济关系基础上相对应的政治、社会及其他非经济的关系得以建立，由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取得政治经济统治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还不十分明显，空想主义者还无法从阶级对立、历史社会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而是试图从道义、社会组织形式、绝对理性等方面构建普遍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的新世界。空想社会主义不抛弃自己的缺点就不足以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抛弃自己的空想就不足以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科学的理论，不立足于现实的生活就无法在生活中实现自己。

作为马克思最为重要的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二者为科学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之源，使得共产主义可以被清晰的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唯物主义历史观很好的解释了阶级之间冲突的原因以及破解这种冲突的现实路径，从而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3]这一科学论断；剩余价值理论首次揭开了资本的“神秘面纱”，从理论上科学的论证了资本的价值及其与人类社会的不相容性。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的难事使得马克思开始由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转向，以及被迫离开莱茵报到法国后直接接触部分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开始更直观的考察工人活动，使得马克思更加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并积极参与工人运动。

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人们之间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理性的规划，而是现实存在着的社会经济力量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文化的现实基础，社会生产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

社会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辩证的动态关系，前者与后者的契合便极大的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总是不断向前推进（呈现非线性而是螺旋式的曲折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都在或快或慢的进行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根据阶级分析与生产力发展状况将以往的社会划分为五种形态，与之相对应产生不同的政治经济组织方式。

2.2 科学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积极的扬弃

私有财产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之后至今的所有阶级社会之中，它是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只要阶级的差别仍然存在，私有财产就不会被完全消灭。土地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统治保障，通过占有土地他们也就占有了奴隶和农奴，通过地租实现了对于奴隶和农奴的剥削，“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时代的到来，地主逐渐转变为资本家，资本家逐渐成为地主，二者逐渐融合为一个统一体，而对于奴隶来说只是换了主人而已，自己的奴隶身份并无实质改变，只是对外的名称由农民变成了工人。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交易，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被纳入了自由交易的市场，都变成了商品，所有的阶级也日益分化为有产和无产两个阶级（其他阶级或早或晚最终都要转变其中某一阶级）。私有财产也由土地领域拓展到商品和资本领域，几乎一切商品化的物品都归属于私有财产的“王国”。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一般从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出发研究经济社会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已经资本化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三要素已经转变为两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在资本所主导的经济世界中，劳动无法实现其潜在的体现人的本质的功能，它不是人的本质承载活动，无产阶级通过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为资本家所占有，留给自己的仅仅满足生存，资本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工人所创造的社会成果并未成为他们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动力，而是反过来成为一种强大阻力。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如同鸡与蛋的关系，起初是由其中一者产生另一者，一旦完成这一步二者便有了互相产生的循环往复的动力。因此不消灭前者也就无法消灭后者，消灭私有财产也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任务。共产主义首先是要变资本的私人属性为社会属性，消灭个人占有者对他人的奴役和压迫，“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

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最初只是存在于经济领域，人们通常也是用经济思维看待私有财产，但自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社会因素，并泛化至社会各个领域，不仅一般的物品成为私有财产，人本身以及同人相关的一切几乎都被私有化了，买卖妻儿如同买卖一般商品一样正常，无需承担太多道德谴责。人不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可以出卖自己的肉体器官，男人、女人、孩子被商品化之后不再成为人而降低为非人。在交易者看来，市场上被买卖的人只是商品，根据市场交易规则自由交换的东西自然可以成为私有财产，在市场中自由买卖交易的东西自然因符合所谓的公平、正义、自由而得到保护。马克思历史的分析考察了共产主义与作为异化劳动必然结果的私有财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共产主义发展史也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史，也就是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4]。共产主义最初只是对私有财产不加选择的全面性认同，此时它对私有财产的不满主要反映为对其占有者的不满，解决方式就是变换占有者。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后者的肯定和确证以及全面的张扬。在这里资本家失去了垄断地位，平均主义是其推崇的主要法则，它期望所有人都成为资本家或者所有人都成为工人，它没有消灭异化而是将异化普遍化。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它并不反映人的本质，人依然是原子式个人，还没有进入类存在和社会存在物的语境。共产主义逐渐从经济的诉求深入到政治的诉求之后，也就不再单纯停留于肯定私有财产的阶段，它已经认识到私有财产是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而存在的这一事实，期望通过建立政治国家或废除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而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实现人的“还原和复归”。然而单纯的否定私有财产并不能真正的消灭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一个历史概念，观念或意识形态上的否定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否定。于是，新阶段的共产主义不再局限于仅仅肯定或否定私有财产，而是进入到否定之否定阶段，这种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向人性的“完全复归”，在这种共产主义中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一切异化和社会矛盾都获得了有效解决，人与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人与自身、个体与类、自由与必然的矛盾都获得了有效解决，人不仅意识到问题的解决，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解决问题的主体力量。

共产主义正是在私有财产现实的经济运动这一实践中不断蜕变并最终进入到科学共产主义阶段，实践的创新和理论的创新都是在私有财产的辩证批判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的。以私有财产所支撑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必然随着私有财产的没落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为人类的解放而服务的科学共产主义所取代。在由无产阶级开启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解放和自由个性发展不仅具有实践的或然性而且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本身就是人类现实化的过程。

3 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端，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4]。与其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点，不如说是人类社会的起点，而最近的将来人类社会的目标则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深入研究人与人及人与物的关系并据此将历史社会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或阶段：人对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私有财产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使人失去或迷失了本质，使人成为非人，而一旦对象成为人的对象或人成为对象性的人，人也就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获得了全面自由，“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4]。

私有财产之所以作为共产主义的首要“敌人”，之所以与人类社会不相容，在于私有财产统治下的世界所有人和物几乎都落入异化的“幻象”。人与人、人与自然处于完全的对立状态，以至于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一方面将自己与自然界的动物明确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却习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竞争思维看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于是在现代社会或异化的社会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性都是自私的”成了人们普遍尊崇的“黄金生存法则”，对财富的渴望成为了最热切的渴望，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了最现实的追求，几乎一切都被商品化或资本化了。在这种市民社会中，人与人是彼此竞争的关系，你的获得必然是我的失去，人对自然变成了简单的索取，自然存在的唯一意义和价值就是被人占有和享用，于是人不占有或拥有某一事物便不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该事物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使人成为非人的异化、物化统治了人的行为和感觉。在个人层面，人成了原子式个人，人与人的对抗迫使人只能通过契约来规范人的行为，竞争几乎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在各种活动中对于名次位次的重视超越了对于活动本身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对事物的占有和垄断欲望无时无刻不侵蚀着人的意志情感，欲望衍生出的畸形儿——贪婪使人永远生活在长期的痛苦与短暂的幸福的无限循环之中，无法走出叔本华的“钟摆理论”；在社会组织层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诉求难以统一，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代表全体民众，于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开启了无休止的斗争，丛林法则成为了这一社会的最高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潜在的力量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零和博弈通行于其间。

正像无神论不再以神为中介一样，在人类历史社会的第三阶段即人类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以物为中介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对于私有财产的辩证否定使人得以复归，人的属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人不再需要借助货币或资本展现自身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应当从主体方面和现实的实践方面考察对象事物，应当打破主客体的固有界限，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主客体实现了融合与统一。若要实现这种统一就必须超越市民社会而进入人类社会，必须超越物的依赖性而达到人的本质的全面展现，破除钱通约一切的魔咒。人的本质的全面展现具有严格的条件：第一，“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第二，“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4]后者同时为前者提供实现的可能性。对象对人来说如同一面镜子，人通过对象了解自己的本质，当人们听到优美的音乐时才知道自己具有聆听音乐的本质，当人们看到风景时才了解自己具有欣赏风景的本质，但是对于对音乐和风景毫无感觉的人来说，他不具有聆听音乐和欣赏风景的本质。如此看来，人的许多本质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经过后天社会实践形成的；人与人的本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具有差异性，不同的人对于同一对象可能展现出不同的本质。正是由于这种实践性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才得以展现出人自身属性的多样性。

在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展现，人真正成为一个通过自身而存在且不依赖于外在的物的自由人。完成这一解放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先进革命的阶级通过阶级革

命终结落后反动的阶级的统治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规律，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4 结语：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七十余年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之源

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从莫尔到欧文再到魏德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但始终没有突破空想的状态，更无法适应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运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完成了这一突破，并且远远超越了前人。在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走向修正主义的不归路时，列宁依然坚定扛起共产主义的大旗，领导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源泉以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为动力基础，经过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终结了列强自 1840 年以来肆意凌辱中国人的历史。改革开放释放了整个社会潜藏的巨大活力，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实践与理论都展现出了自身活力，前者的发展为后者的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源泉，后者的创新又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南和思想动力。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保持着持久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在当前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持续创新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

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前还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相应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制度也具有过渡性，过渡性就意味着在这一时期既包含过去的东西又包含未来的东西。之后才能进入不十分完善的作为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只有进入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正如不能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标准评价初级阶段一样，自然也不能用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评价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不能用发达资本主义的标准作为衡量标准。新中国七十余年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由建国之初的积贫积弱到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都获得了快速进步与发展，这种进步与发展正得益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根据时代特点实现了持续创新并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代表机械固守前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那是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恰恰最为反对教条主义。植根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土壤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活力日益彰显，它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它之所以能够代表时代发展方向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辩证批判性，它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历史实践。

不理解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殊国情的人总爱拿市场经济、资本、两极分化等所谓的资本主义特有物质质疑中国的社会性质。他们不理解市场、资本的性质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动而变动；他们不理解两极分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历史的产物只能在历史的发展中的被消灭，违背历史发展阶段阶段的行为只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正在推进的扶贫事业和各项公共事业建设正在加速两极分化的消亡。在私有财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虽然不少富豪们热衷于慈善，但他们依然掩饰不了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及其本人生活的奢靡，更掩饰不了其财富主要来源于工人的劳动而并非自己辛勤劳动这一事实，偶尔给予工人的恩惠主要是为了使工人成为更驯服的奴隶并能够为他们创造更多财富而已。中国历来不是扩张型国家，更没有英美西方国家的殖民传统而其本身就是殖民体系的受害者，但对中国缺乏了解且存在偏见的西方人不理解中国所倡导的共建共荣新发展理念和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主义思想，他们更愿意相信“零和博弈”和“修昔底德陷阱”，无论散布中国威胁论还是唱衰中国都只是他们私有财产基础上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已。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47，53.
- [2] 闫志民，王炳林，贺亚兰，主编. 社会主义 500 年编年史：上卷[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10，13-14，20.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4，527-528，530，588.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0，182，190，197.